



民族学报

第六辑

JOURNAL OF ETHNIC STUDIES

云南民族大学 编

民族出版社



JOURNAL OF ETHNIC STUDIES

云南民族大学 编

第 六 辑

民族学报

民族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族学报. 第6辑/汪宁生主编.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8. 8

ISBN 978-7-105-09540-7

I. 民… II. 汪… III. 民族学—丛刊 IV. C912.5—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23362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mzcbs.com>

北京市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汉文二室电话: 010-64228001 发行部电话: 010-64211734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16 印张: 24 字数: 538 千字

印数: 0001—2000 册

ISBN 978-7-105-09540-7/C·287

(汉 261)

定价: 58.00 元



巨石立面侧视（从北向南摄）



采果图



放牧图



局部画面的黄色底层



房屋、牛栏



群舞图



群舞图之首领



采果、放牧图



围栏人物中的掌印图



祭典图

漾濞苍山岩画

目 录

Contents

- 001/ 谈土家族的族源问题 蒙 默
- 035/ 大理国史新证
——从石钟山石窟与梵像卷谈起 李玉珉
- 057/ 赴滇西宣慰日记（1942年8—9月）
——滇西各族抗战史片断 尹明德
- 081/ 新疆奥尔得克墓地的新发现和全面发掘 [美] 梅维恒（Victor H. Mair）
- 109/ 漾濞苍山岩画调查 杨德文
- 123/ 从耳杯到圆杯：中国饮器的变化（公元2世纪到6世纪）
——以吴越地区为例 [法] 毕梅雪（Michèle Pirazzoli-t'Serstevens）
- 139/ 郑和布施锡兰山佛寺碑研究 龙村倪
- 163/ 最早发现的女书
——记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田广洞某妇致亲家娘书》 谢志民 谢雯
- 189/ 释南诏的“鹅闾” 王敬骝 王育弘
- 201/ 纳西族东巴经中的“五行”资料 李国文
- 237/ 傣语四音格中的傣族文化 吴东海
- 259/ 云南朴拉人（彝族支系）传统制陶术 王亚文
- 293/ 云南师宗彝族“绑神猴”仪式调查 王 均 贾向云
- 311/ 摩梭人婚姻形态变迁的研究 [日] 金绳初美
- 331/ 台湾原住民部落大学课程规划与教学实施之研究 陈技烈
- * 书 评 *
- 349/ 评陈建宪、彭海斌译《世界民俗学》 谢国先

Contents

On the Origin of Tujia people	Meng Mo	/001
New Evidence for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the Dali Kingdom: Derived Mainly from Shizhong Mountain Grotto and Buddha Images Scroll	Li Yumin	/035
The Diary of a Trip to Western Yunnan for Propaganda and Mobilization (August-September, 1942): A Historical Fragment of Western Yunnan Minorities Participating in the Anti-Japan War	Yin Mingde	/057
The Rediscovery and Complete Excavation of Ordek's Necropolis	Victor H. Mair	/081
An Investigation on Rock Paintings in Cangshan, Yangbi County	Yang Dewen	/109
From the Ear-Cup to the Round Cup: Changes in Chinese Drinking Vessels (2 nd to 6 th Century AD)	Michèle Pirazzoli-t'Serstevens	/123
A Study on "The Galle Trilingual of Zheng he Stone" Donated to Buddha Temple in Sri Lanka	Long Cunni	/139
The Earliest Discovery of a Female Written-language Document: Notes of <i>Tian-guang-dong Mou Fu Zhi Qin-jia-niang Shu</i> (The Letter of a Woman in Tian-guang-dong to Her Son's Mother-in-Law) Collected in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Xie Zhimin Xie Xie	/163
An Explanation on "e que" (鵝鵒) of Nanzhao	Wang Jingliu Wang Yuhong	/189
Records of "Five Elements" in Dongba Hieroglyphic Texts of Naxi People	Li Guowen	/201
Dai Culture as shown in Dai Linguistics "Four Syllables Expressions"	Wu Donghai	/237

Tradional Pottery-making of Pula People (a Branch of Yi Nationality)	Wang Yawen	/259
An Investigation in the "Binding Sacred Monkeys" Rite of the Yi People, Shizong County , Yunnan	Wang Jun Jia Xiangyun	/293
A Study on the Transition of Mosuo People's Marriage Pattern	Kanenawa Hatsumi	/311
A Study on the Curriculum Planning and Teaching Strategies of Aboriginal University in Taiwan	Chen Zhilie	/331
* Book Review *		
A Review of <i>The Study of Folklore</i> (Chinese Version) Translated by Chen Jianxian and Peng Haibin	Xie Guoxian	/349

谈土家族的族源问题

蒙默

(四川大学)

关于土家族的族源问题，我经过较长时间思考，又曾于20世纪80年代初到川黔湘鄂土家族地区考察，对有关专家进行专访，交换意见。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形成我自己的一些看法，和当前土家族源研究者的主流看法有所不同。^[1]

我认为研究族源问题首先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应当重视民族民间关于各该民族的古代迁徙和生活的传说，这是他们自述的历史，有很高价值，各个民族都有不少这类传说，但往往不被学者们所重视。学者们似乎更重视文献中关于各该民族现在居住地区的古代记载和出土文物。无可置疑，这类资料是重要的。先君文通公曾指出：“研究民族史，应当是与地方史有联系的，但二者又是截然不同的，是两种范畴。地方史是以地域为中心，是静止的；民族史则以民族为中心，而民族则常常是移动的，不能局限在某一个地区。”^[2]假如这些资料所反映的是该民族到达该地区之前的情况，则这些资料就只能作为地方史资料而不能作为民族史资料。这些资料远不如民族民间的古代传说更为值得重视。

第二，不少民族常常不止一个族源，而是多源的。特别是人口较多、居地宽广、文化复杂的民族，更是如此。在一个多源的民族中，不能对众多的族源平列看待，而应有主源和非主源的区别。主源在该民族的起源和发展中起主导作用，非主源则只起次要作用。其关系有如一棵大树的主干和枝干，作画不能弄清这棵树的主干和枝干，则其杂乱无章也就不言而喻。因此，研究一个多源民族历史，弄清其民族形成的主源便是首要的问题。

第三，如何探索起主导作用的主源呢？我认为，凡是一个多源的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必然通过民族间的自然融合或强制同化，一些民族丧失其原来的民族特征而共同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在这些民族特征中民族语言是很重要的一环。在民族融合（或同化）中，必然产生语言的融合，而语言的融合，“只能通过一些语言被同化，另一种语言取得胜利的方式进行”^[3]。这一取得胜利的语言就成为该民族的民族语

1 蒙文通：《治学杂语》，见蒙默《蒙文通学记》（增补本），第1版，24页，北京，三联书店，2006。

2 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260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言。因此,自始就能操该民族民族语言的支系就是该民族在起源和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主源。

土家族是一个拥有 8028133 人口(2000 年)、住地跨越湘鄂渝黔四省市、文化习俗颇为复杂的民族。土家族是一个多源的民族,这也是土家族研究家们的共识,其主源应当从能说土家语自称“比兹卡”的那一支系的古代史上上去探寻。土家语长期以来被认为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中的一种独立语言。近年来,何天贞教授提出土家语属于藏缅语族羌语支的崭新看法¹,可说是土家族研究中的最新成果之一。在这个民族自称“比兹卡”的支系中,长期保存着土家语的《摆手歌》、《梯玛歌》,流传着不少民族民间传说和独特的民族习俗,这些都是探索土家族族源的重要资料,应当给予高度重视。

一、巴人指“巴地之人”,包含的民族非止一种

湘西土家族是巴人之裔的说法,由潘光旦先生的大作《湘西的“土家”与古代巴人》最早提出。我虽不同意潘先生的结论,但认为其个别论断还是有可取之处。这篇文章对土家族研究者有着颇大的影响,现在有些人的“新论”尽管不说出自潘氏,实则取自潘文。我们讨论土家族从潘文说起,也可说从源头谈起。

首先说什么是巴人。现在不少人都认为巴人是民族名称,甚至有称巴族者,我认为这个看法值得考虑,潘先生在他的大文中有段很好的论述。他说:

我们的看法是,“巴”原是地名,指今鄂西川东地区,鄂西小一半,川东大一半;在巴人到达该地区以前,便有此地名了。及至巴人来到,生聚发展,外间的人即用地名来称呼他们,“巴地之人”,就是巴人。

这个说法先得我心之妙。“巴人”既是“巴地之人”,那就可能不止一个民族。遗憾的是,潘先生没有进一步探讨巴人的民族问题,而顺从世俗的看法把巴人视为一个民族,且是以康君为代表的民族,这就有问题。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古代巴国地区“其属有濮、賁、苴、共、奴、僇(原作猿)、夷、蜒之蛮”。指出巴地有八个民族,《华阳国志》所说的巴,东到鱼腹(今重庆市奉节县)为止。故不包括鄂西地区的康君。于此可见巴地的民族不少,但其中恰恰没有一个巴族,这值得我们那些主张有所谓巴族的学者深思。

关于巴地的民族问题,邓少琴前辈在《巴蜀史迹探索》中曾作过有益的考论²。我

1 何天贞:《土家语的支属问题》,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 23 卷第 1 期,2003 年 1 月。

2 邓少琴:《巴蜀史迹探索》,第 1 版,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后收入《邓少琴西南民族史地论集》,成都,巴蜀书社,2001。

也写过《试论古代巴蜀民族及其与西南民族的关系》一文¹，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这里只讨论与土家族族源问题有关的板楮蛮人和廩君蜒人。且先从潘文所说的巴人——廩君蜒人谈起。

二、关于廩君蜒人

(一) 廩君蜒人非羌戎民族，乃百越民族之一支

关于廩君的记载，以作于战国晚期的《世本》为最早，此书早佚，清人有多种辑本，中华书局出有《〈世本〉八种》，搜集颇全。东汉晚期应劭的《风俗通义》和刘宋时范曄所著《后汉书》中关于廩君的记载，都是根据《世本》而详略不同。《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李贤注：“《代本》曰：廩君之先，固出巫诞也。”“《代本》”就是《世本》，避唐讳改。“巫”，地名，治今重庆市巫山县。“诞”，《太平寰宇记》卷一四七引作“蜒”，两字古通用。“巫诞”就是巫地之蜒。这里对廩君的族属说得很清楚，是蜒人的一支。关于蜒的系属，《隋书·南蛮传》也说得很明白：

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蜒、曰僮、曰俚、曰僚、曰徭，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其俗断发文身，好相攻讨，浸以微弱，稍属于中国，皆列为郡县，同之齐民，不复详载。

蜒人是古代百越民族之一，也就是现今壮侗语族民族的先民之一，这说得明白无误。但是，有的学人却仍坚持说廩君是古代氐羌民族。（由于文献上关于氐族的记载较晚，在先秦只与羌人连缀为词，无甚代表意义。而戎人在先秦的记载颇多，用羌戎联称更具代表性，下文皆用“羌戎”以代替世俗所称“氐羌”，不再另作说明。）

我们先讨论廩君是羌戎民族的问题。主此说者，主要根据下列两条文献：

《路史后纪一》：“伏羲生成乌，咸乌乘厘，是司水土，生后炤，后炤生颛相，降处于巴，是生巴人。巴灭，巴子五年流于黔而君之，生黑穴四姓，赤穴（原误作狄）巴氏服四姓为廩君。”

《古文尚书·序·正义》引《帝王世纪》：“伏羲氏母曰华胥，有巨人迹出雷泽，华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羲于成纪。”

这两条文献成书甚晚，很难据此考证远古历史，记载本身和据此所作巴人源于羌戎的分析都有问题，似毋庸置辩。

关于蜒人的记载，以《淮南子·说林训》为最早：“使但吹竽，使氏厌窍，虽中节而不可听。”一般都释“但”为“蜒”，但恨不知这个但人居住何处？《华阳国志·巴志》载古巴国“其属有濮、賈、苴、共、奴、僰、夷、蜒之蛮”。似乎远在古巴蜀时代

1 蒙默：《试论古代巴蜀民族及其与西南民族的关系》，载《贵州民族研究》，1983（4）。后收入蒙默：《南方民族史论集》，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

在今川东及重庆市地区已有蜒人居住。这片地区与廪君族活动的鄂西南清江流域毗邻，廪君既为蜒人，川东、重庆市有蜒人也就不足为怪。据《巴志》所载，巴东郡“有奴僮夷蜒蛮民”。涪陵郡“多僮蜒之民”，“诸县北有僮蜒”。《蜀志》载巴郡亦有僮蜒。这些蜒人显然应当是古巴国时期蜒人的后裔。

《三国志·黄盖传》载：盖为武陵太守，“寇乱尽平，诸幽邃巴、醴、由、诞邑侯君长皆改操易节，奉礼请见，郡境遂清。”“邑侯君长”是王朝对少数民族部落首领的封号（《续汉百官志》）。潘光旦先生用“四个族类的名称”解释“巴”、“醴”、“由”、“诞”，除用土家族释“巴”不准确外（应如《舆地纪胜》卷174引《涪州图经》所云：“巴则廪君之后”），其余释“醴”为“俚”、释“由”为“徭”、释“诞”为“蜒”，都可以接受。这说明三国时期武陵郡（今湘西地区）有蜒人。晋朝的天门郡在武陵郡北，跨今湘鄂接壤的澧水流域，北与廪君活动的建平郡、宜都郡毗邻。《晋书·孝武帝纪》载：宁康二年，“天门蜒贼攻郡，太守王匪死之”。能攻郡杀太守，表明这里的蜒人不在少数。

六朝时期，蜒人的分布并不局限于武陵湘西，由于廪君之族在东汉以后向东北迁徙，已东至宋、齐的东阳郡（今鄂东皖西一带），北至元魏的东荆州（今河南南部）¹。《南齐书·州郡志》说：荆州“境域之内，含带蛮蜒”。《陈书·徐世谱传》：“世居荆州，为主帅，征伐蛮蜒。”《通典·州郡典》也说：古荆州“州境之内，含带蛮蜒”。《通典》所说当是唐代情况，而“古荆州”的范围更宽广，包括今湖南、湖北两省之地，所以《隋书·地理志》说：“长沙郡又有夷蜒。”《通典·边防典·序》自注说：“潭、衡人蜒，取死者骨，小函盛置岩石间。”

汉唐之际的川渝蜒人也颇活跃。《南齐书·明僧绍传》：“建元元年，为巴州刺史，绥怀蛮蜒。”《南齐书·州郡志》巴州残缺，据《太平寰宇记》卷147及龚煦春《四川郡县志》，南齐之巴州实领巴郡、巴东、涪陵、建平（属七县，四县属鄂西南、三县属重庆市）四郡。《梁书·张齐传》：天监七年，张齐为巴西太守，“十年，郡人姚景聚合蛮蜒，抄断江路，攻破金井，齐讨破之。”《周书·陆腾传》：“天和初，信州蛮蜒据江峡反叛，连接二千余里，自称王侯，杀刺史守令等，又诏腾率军讨之。”据王仲莘《北周地理志》，信州诏令奉节，统永安、巴东、秭归、建平四郡，为三峡东西沿江之地，这里的蛮蜒能“连接二千余里，自称王侯，杀刺史守令”，其人数显然很多。据《周书·蛮传》所载，其中大姓有冉、向、田，冉、田皆为槃瓠，向姓则为蜒人。向姓现在还是奉节和鄂西土家族的大姓，他们的家谱自称是廪君之后²。居于巴地的蜒人被称为

1 参见蒙默：《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蛮”》，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19卷；后收入《南方民族史论集》，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

2 参见蒙默：《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蛮”》，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19卷；后收入《南方民族史论集》，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

巴蜒。《隋书·杨素传》：“（隋）大举伐陈，以素为行军之帅，引舟师趣三硤，……（陈吕）仲肃复据荆门之延州，素遣巴蜒卒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柏橦碎贼十余舰，遂大破之。”《通鉴》系此事于开皇九年，胡三省注曰：“蜒亦蛮也，居巴中者曰巴蜒，此水蜒之习于舟者也。”巴蜒为隋的大一统立下了汗马之劳。唐陈子昂《谏雅州讨生羌书》说：“窃闻道路云，国家欲开蜀山，自雅州道入讨生羌，因以袭吐蕃，执事者不审其利害，遂发梁凤巴蜒兵以徇之。”是巴蜒未必仅习于水战，也长于陆战。

《太平寰宇记》卷120载黔州“控临蕃种落”。唐宋黔州治在今重庆市彭水县，其控临范围颇广，包括今重庆市东部、贵州省东半部及湖南西缘，控临的蕃落有十五种，其中有巴人、白虎、蛮蜒，巴人指廪君之后，白虎为板楯蛮人，皆未言居住何地。只在彭水县说：“五溪、谓酉、辰、巫、武、沅等五溪，……一说五溪蛮皆槃瓠子孙，自为统长，故有五溪之号焉，古谓之蛮蜒聚落。”此明谓蛮蜒居于今重庆市东南部及湘西地区。

据唐张鷟《朝野金载》、南宋朱辅《溪蛮丛笑》所载五溪蛮的葬俗都是二次葬的崖葬，前揭《通典》说“潭、衡人蜒”是二次葬的崖葬，与《太平寰宇记》说五溪蛮是蛮蜒部落相合。1983年我去川黔湘鄂土家地区访问时，在彭水、黔江、秀山、松桃、泸溪等地都远看到崖葬墓的遗存，惜不能近睹，未审其时代。同行的王和平君和陈明芳女士乘船沿西水考察，也看到不少崖葬墓。《湘西土家族》（初稿）也载西水流域和桑植、花垣、吉首、泸溪、凤凰、大庸等县都有崖葬墓¹。张雄先生《鄂西悬棺葬和“巴蜒”》记载了利川、恩施、巴东、秭归、宜昌等地都有崖葬墓²。林向先生《川东峡江地区的崖葬》载，在奉节、巫山、巫溪三县于1980年一次调查就发现24个崖葬点³。其时代较早者在战国时期，晚者在东汉甚至更晚。学者们基本同意是蛮蜒之民的墓葬。这些民族墓葬的分布与上面所考论蜒人的分布基本相合。

汉唐间居住在川黔湘鄂地区的蜒人，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后，“其与夏人杂居者则与华不别，其僻居山谷者，则语言不通，嗜好居处全异”（《隋书·地理志》“荆州”）。显然与汉人融合者已不在少数，故隋唐之世已不再为史家所重视，《隋书·南蛮传》说：“皆列为州郡、同之齐民，不复详载”。因而对他们的情况也就渐渐不太了解，《隋书·地理志》便出现了“长沙郡又杂有夷蜒，名曰莫徭，自云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这样模糊不清的语句。百越民族的蜒人竟然被之以槃瓠民族的“莫徭”之名，实在令人难解。由于这句话的含义模糊不清，导致了有的学者认为蜒人是苗瑶民族的先民⁴。大概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起，直到现在，百越民族和苗瑶民族是在南方长期

1 参见《吉首大学学报》1981年第二期《民族问题专刊》。

2 参见张雄：《中西部民族历史文化论丛》，145～153页，香港，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

3 参见林向：《巴蜀考古论集》，315～333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4 参见童恩正：《古代的巴蜀》，第1版，51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

并存的两个语言、文化都不同的族系,“夷蜒名曰莫徭”的说法显然不妥。《隋书》这句话,早在唐代就已引起人们的怀疑。《元和郡县志》在江南道潭州下说:“今按其俗,杂有夷人,名徭,自言先祖有功,免徭役也。”唐潭州又称长沙郡,就是隋的长沙郡。两个记载的文字大致相同,显是《元和郡县志》用《隋书》的旧文,但其中又有很大差异:一是《元和郡县志》不作“杂有夷蜒”而作“杂有夷人”;二是不作“名曰莫徭”而作“名徭”。按今瑶族先民在唐代多作“莫徭”,偶有作“徭”者;宋代则多作“徭”,偶有作“莫徭”者,学者们认为“与封建统治者对瑶族先民的徭役征发有着密切的联系”¹,二者都是瑶族名称。前一差异则明白显示了二者确有不同。这一差异的产生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隋书》原本就作“夷人”;二是《元和郡县志》的作者感到《隋书》作“夷蜒”不妥,有意识加以改正。如果信从今本《隋书》,那就只好读为:“长沙郡杂居着包括蜒人在内的少数民族,其中一种名叫莫徭。”像这样“增字解经”,与吴永章先生的理解大体相合²,也都不同意蜒人是苗瑶民族的先民。

廪君蜒人又有巴人之称,但巴名之起当由于其地本名巴,故《水经·夷水注》说:“昔廪君浮土舟于夷水,据捍关而王巴。”是以史称其地为“巴中”,称其民为“巴夷”³。然巴地之名既不始于廪君之时,巴地之广亦不限于廪君所居。先君《越史丛考》尝言:

《太平御览》卷一七一引《十道志》载:
“故老相传,楚子灭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黔中,汉有天下,曰酉、辰、巫、武、沅等五溪,各为一蛮之长,故号五溪(蛮)。”是汉武陵亦巴也。《礼记·檀弓》言:“舜葬苍梧之野。”《墨子·节葬下》言:“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巴之中(原讹作‘南巴之中’,据《后汉书·王符传·注》引文改)。”是苍梧古有南巴之称也。疑自楚以西、自巴以南至苍梧,古皆称巴。

汉武平南越置苍梧郡,有今桂东及粤西北,当即古苍梧之地。但苍梧之地不止于此,《山海经·海内经》载:“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渊,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则当北至湘南。《通典》卷187注苍梧为“今长沙、衡阳等郡地”。《路史·国名记》丙:苍梧“地广,东至湘、潭”。都大抵相合。《通典》卷183:“岳州,古苍梧之野。”自注:“苍梧野不止于此郡界,侧近之地皆是。”岳州治今岳阳,则苍梧已北接洞庭。《后汉书·南蛮传》载:吴起相楚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则是苍梧确实北接洞庭。这一大片古苍梧之地都有巴称。自隋唐而后,这一地区蜒人的记载稀疏,而巴人之称代之而起。潘光旦先生从《全唐诗》中搜集了十位诗人都有“巴俗”、“巴歌”、“巴人”、“巴子国”、“巴童”、“巴江”的诗句,又考证了做

1 《瑶族简史》编写组:《瑶族简史》,第1版,10页,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3。

2 参见吴永章:《瑶族史》,第1版,92页,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

3 《后汉书·南蛮传·廪君传》,称其地为“巴中”。《蛮书》卷十引《廪君传》文,称之为“巴夷”。

诗的地点，得出结论：

上面十个诗人的诗句已经足够说明唐代洞庭流域与其西南的大片土地上是住着很多巴人的，东自岳阳，西至沅陵，所在都有。至于沅陵以南，今湘黔公路以北，巴人自也不少，但因迁谪到那里的不多，留下的篇什也就不多了。

这些巴人实际上也就是蜒人，巴是以地为称，蜒是以族为称，其实都是一族，可能因为“下里巴人”之歌为文人士们所熟知，在他们的笔下便信手写来。宋元时代没有见到巴人的记录。到了明代，邝露在他所著《赤雅》中又有巴人的记载：

怀远石阵临溪，阴风惨人，犹闻鬼哭。昔武侯立营于此，夜令云：枕石者去，枕草者留，中夜撤军。枕石者不寐，枕草者熟睡，遂留斯土。遗种斯在，尚能操巴音而歌乌乌。

“蜒”字又或写作“但”。清代文献记载怀远有但人。嘉庆《广西通志·诸蛮列传》载：

但人，居山谷，种山禾，日暮始舂，无隔夜之炊，单衣不利于寒，长袴不利于走，较诸蛮最为愚弱。怀远有此种。

《粤西丛载》卷十八《蛮习》引《怀远县志》：

怀远之夷，有僛、伺、僮三种，又有伶、但、苗三种。其情不甚相远。

在记叙风俗习惯时，作者大概认为“其情不甚相远”，所以未予分别叙述。其中说：“怀之夷不能越怀之疆，薄暮始舂禾粃为三餐食，而粮无隔宿，单衣不利于寒，长袴不利于走，饮水用槽和而不耐于饥渴。”结合《嘉庆志》来看，显然是指但人。194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刘锡蕃所著《岭表纪蛮》也载：

今吾桂及黔南一带，尚有所谓但族者，但与蜑同音，是必在陆为但、在水为蜑，最先原为一族，其后逃窜分离，因而发生字异耳。其人原居桂粤西江上下流，其语言在客语、粤语、僮语之间。

巴人、但人居三江，属黔古州。

民国时期的三江，就是清代的怀远。刘氏把巴人和但人列为同类，与上面的分析相合，可说是又得一证。但他把但人与宋以后两广、福建沿海和珠江三角洲的蜑户（今称水上居民）认为“原为一族”，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我们同意《蜑民的研究》作者陈序经先生的意见：“有待继续研究”，暂时搁置起来。至于但人与今天什么民族有关，则是正需要探索的问题。

（二）从族称、语言、文化等方面看古代蜒人与今天侗族的关系

居住在桂黔湘之交的但人，不见于当今我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中，而只在侗族中有

1 《太平寰宇记》卷163载新州（治今广东新兴县）：多纶木，“皮可以为绵，但僛緋以为絮。”《舆地纪胜》卷97“新州景物”引此作“皮可以为锦（当作绵），僛僛緋以为絮。”正是但、蜑（蜒）通用。

2 《清》汪森：《粤西丛载》，见《笔记小说大观》第十八册，246～247页，南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